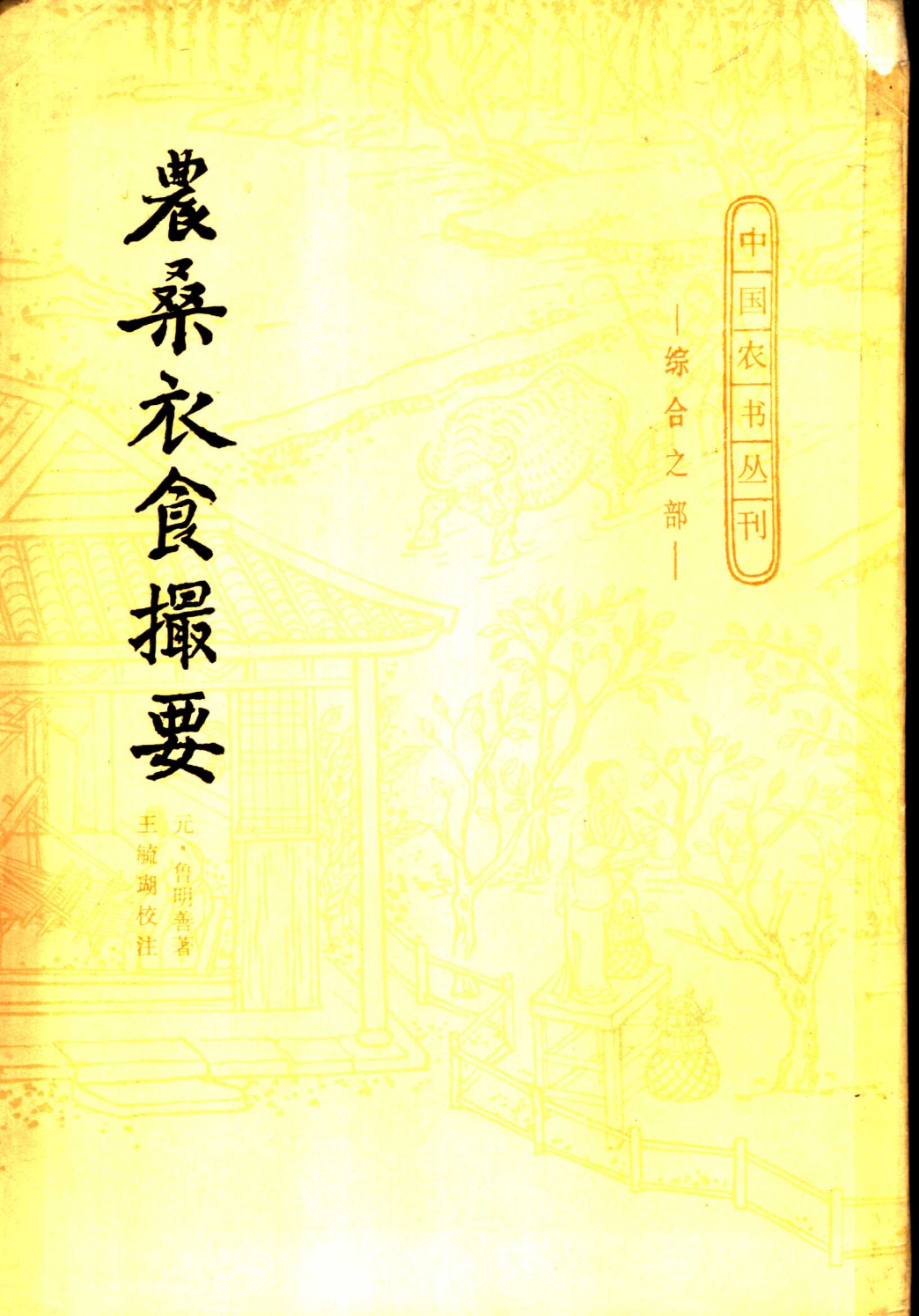


中国农书丛刊

——综合之部——

農桑衣食撮要

元·魯明善著
王毓瑚校注



元・魯明善著
王毓瑚校註

農桑衣食撮要

農業出版社

农桑衣食撮要

元·鲁明善著
王毓瑚校注

农业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625印张 76千字
1962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2,001—13,300册

统一书号 16144·1244 定价 0.61元

出版说明

这本书是元代「月令」体裁的综合性农书，离现在虽已有六百多年，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记述技术经验的同时，夹杂一些封建迷信等糟粕，为了保存原貌，校订时未作删节。对于诸如这些地方，希望读者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待。

校訂「農桑衣食撮要」引言

「農桑衣食撮要」在古代農書當中，也算是比較好的一部。不過近世通行的本子，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字句有不少是錯誤的。現在根據較早的板本作了補充，同時參對各種本子，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校勘。經過這番整理之後，仍然還是有一些疑難的地方沒有獲得澄清，只是希望對於讀者多少有些幫助而已。

這部農書的部頭並不大，但是它的流傳過程却是有一些波折的。這方面的情況需要說明一下。而在介紹本書各種板本的淵源之前，又有必要先弄清楚書名的問題。

本書近世流行各本的書名都作「農桑衣食撮要」，四庫全書總目裏面也是這樣著錄的，好像是沒有什麼問題。可是現存的兩種明代刻本，都題的是「農桑撮要」，沒有「衣食」二字。除此之外，北京圖書館還藏有一部明板書，書名是「養民月宜」，內容同那兩部明刻「農桑撮要」完全相同。爲什麼同一部書而有各種不同的書名呢？我們的解釋是：在明代的文人當中，流行着一種很不好的習氣，這就是對待前人著作的態度很

不嚴肅。他們往往在傳刻時隨意改頭換面，或者更動內容，有的更是有意地作偽，目的就在欺騙。「養民月宜」這個標名，自然是傳刻者隨意改題的。總算還好，書的內容沒有給改動，可使我們毫不懷疑地肯定就是這一部書。在這裏附帶着提一下：明人高儒的「百川書志」裏面，農家類有「農桑四時撮要」一卷，後面有註文說是「不知作者，按月令敘事，幾二百條」。註文所說的書的篇幅和體裁，都與本書相符，書名也很相近，這就使我們有理由懷疑，是不是這部題名為「農桑四時撮要」的農書同樣也就是「農桑衣食撮要」。如果這種猜測不錯，那就是本書在明代的刻本中還有這樣一個「別題」了。

「養民月宜」是可以肯定的，「農桑四時撮要」只能作為存疑，這都不在話下。比較成問題的是「農桑撮要」這個名子。明人周弘祖所編的「古今書刻」，記錄了當時各省所刻書籍。南京國子監、淮安府、揚州府、瑞州府、建寧府書坊和汝寧府所刻的書裏面，就都有「農桑撮要」這部書。「趙定宇書目」裏面，也載着有「農桑撮要一本」。這個書目是一概不載書的作者和卷數的，但是從書的分量上來推測，顯然也就是這一部書。既然我們所見到的明代目錄學家都是用的這個名子著錄，現存的兩種明代刻本也都是題的這個名子，這樣我們就至少可以暫時認為：在明代，一般是把「農桑撮要」視為

本書的書名的。

本書的清代各種刻本題名是「農桑衣食撮要」，而明代各種刻本題名又作「農桑撮要」，依時代的先後來說，似乎是書名本來並沒有「衣食」二字的。尤其是作者的自序上有「乃者叨蒙憲紀之任，因思衣食之本，取所藏『農桑撮要』刊之學宮」的話，作者本人把書名叫作「農桑撮要」，應當是這種想法的更爲有力的根據。不過我們經過反覆考慮之後，還是覺得本書當初題名是有「衣食」二字的。清刻各本源出於四庫全書本，而後者是鈔自永樂大典的。大典是明代初期編纂的，當時所根據的極可能是元代刻本。傳鈔自然難免錯誤，但是把書名弄錯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此可以相信，元刻本的題名是有這兩個字的。此外「古今書刻」所載南京國子監刻書當中，在「農桑撮要」的前面是「農桑衣食」。這部書却從來沒有聽說過，而且這四個字也不大像是一部書的題名。因爲這兩個書名前後緊排在一起，這就使我們懷疑，是不是本來就只是「農桑衣食撮要」一部書，而被鈔寫人誤分爲二。當然這也只是一種猜測，提出來僅僅是供作參考。至於爲什麼作者自序裏面用了「農桑撮要」的名子，可以解釋爲對書的簡稱。因爲上句剛剛說了「衣食之本」，爲了行文避免重複起見，書名略去「衣食」二字，原是不足怪的。

無論如何，我們對於明代的傳刻者是不能盡信的。在沒有找到更為確鑿的證據以前，我們覺得還是因襲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名子較為妥當。

在這裏還需要順帶着說明一下的是：清代錢大昕的「補元史藝文志」裏面，在「農桑衣食撮要」的下面有一個「一作『農案機要』」的註，大約是根據的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黃氏書目農家類著錄的有「魯明善農桑機要」一書，下面註着「監壽州時編」，那顯然就是本書。錢氏當時自然只能依據官頒的四庫全書著錄，因而加上了這一註文。「桑」字和「案」字很相似，多半是鈔寫人或刻書人給弄錯了。而黃氏書目裏的「農桑機要」，又一定是「農桑撮要」之誤；致誤的原因同樣也是由於「撮」、「機」二字的字形相近。這樣的一再差誤，都犯在這同一部書的上面，也真是事有湊巧了。

由「農桑撮要」這個題名，又不免牽引出來另外的問題，也需要在這裏分辯清楚。明人焦竑的「國史經籍志」農家類裏面，著錄的有「羅文振農桑撮要七卷」。後來清人倪燦的「補遼金元藝文志」和錢大昕的「補元史藝文志」也有同樣的著錄，大概都是因襲的焦氏。這部同本書題名相同而卷數和作者又都不同的農書，從來沒聽說有人見過，很可能就是本書，而是焦氏誤記了卷數和作者。明末清初的黃氏「千頃堂書目」裏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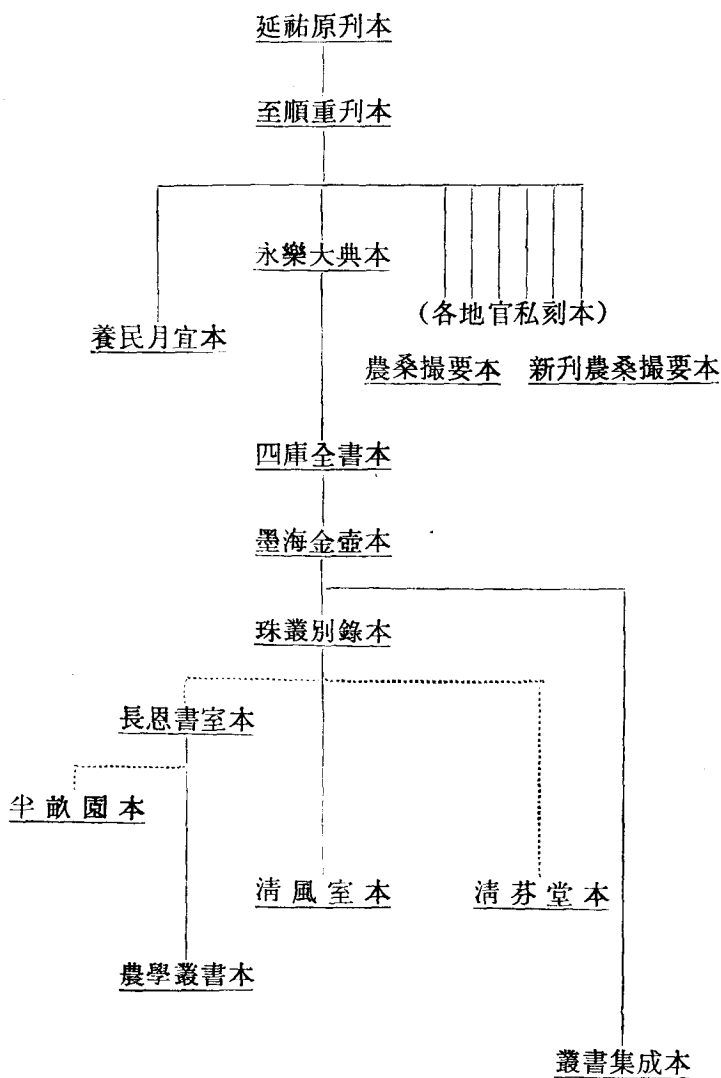
確是也有同「國史經籍志」一樣的著錄，黃氏是當時著名的大藏書家，既然是根據藏書寫出的書目，論理應當是實有其書的。不過現在通行的黃氏書目，顯然是根據未經徹底整理過的稿本刊印的，所以裏面有些地方顯得凌亂。羅文振這部書的下面，緊接着就是「魯明善農桑機要」。我們猜想，黃氏實際只藏有這部魯氏的「農桑撮要」，可能是爲了備作參考，把「國史經籍志」的這一著錄記在一旁，後來却被當作正文處理了。當然這只是猜想而已。羅文振這部書，還是應當作爲一個懸案保留起來。

書名問題弄清之後，就可以談談板本的淵源了。本書在元代至少有延祐甲寅原刊本和至順元年重刊本這兩種本子。到了明代初期編入了永樂大典，而各地官府以及民間，後來多有傳刻。元代刻本早就見不到了。我們現在見到的明代刻本有三種，其中兩種題名是「農桑撮要」，（一種前面多「新刊」二字。）其他一種，書名作「養民月宜」。這三種本子基本上相同，大約是一個來源。除此之外，周履靖編刻的「夷門廣牘」裏面，也收的有「農桑撮要」一種，內容非常簡略，像是一份目錄，我們沒有把它計算在內。到了清代，最初似乎不大被人注意，這大概是因為「農桑輯要」、「農政全書」一類大型農書普遍流行，清朝官方又先後編成了「廣羣芳譜」、「授時通考」等書，這樣一來，

連規模較大的「王禎農書」都已不經見，本書自然也不再被人提起。到了後來官方纂修四庫全書，又標榜採用外間無法見到的永樂大典鈔本。四庫總目本書提要裏面提到「別本」有導江張槩的序，這所說的「別本」，顯然就是明代通行的刻本之一。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本子無法同大典本競爭，只有遭到擯棄的。從永樂大典錄出的這個本子，就叫作「四庫全書本」。嘉慶年間張海鵬編輯「墨海金壺叢書」，收進了許多種錄自永樂大典的書，本書也在其內。依照叢書凡例上所說的來推測，大概是根據的文瀾閣藏本。這部叢書的刻板，不久就遭了火災。道光年間，錢熙祚又重刻一次，收入他的「珠叢別錄」叢書中。再以後咸豐年間刻的「長恩書室」、同治年間刻的「半畝園」、光緒年間的「清芬堂」、「清風室」等叢書以及「農學叢書」和民國時代商務印書館所出的「叢書集成」裏面，也都有這一部書，只是沒有過一種單行本。「珠叢別錄本」是從「墨海金壺本」下來的，「清風室本」又是根據的「珠叢別錄本」。「叢書集成本」也是依據「墨海金壺本」排印的。「長恩書室本」和「半畝園本」幾乎處處都是一個樣子，很像就是同一個板。而「農學叢書本」又是「長恩書室本」的翻印。所有以上幾種本子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內容都比明刻各本少一部分，再就是有的地方安排的位置不同；而且是比

明刻短少的部分以及安排位置不同的地方，各本也都完全一樣。只有「清芬堂本」沒有見到，大概也不例外。因此可以說，這些本子基本上是相同的，總根是「墨海金壺本」，而後者又是出自「四庫全書本」。自從有了這個本子之後，明刻本就更加隱沒不彰了。題名「農桑輯要」的那兩種明代刻本沒有記着刻書的處所，也許就是在「古今書刻」所載的那幾個地方之中。總括起來，可以列成一個表，大約表示板本的淵源。

本書內容是就一年中十二個月分別列舉每個月份之內農家所應從事的作業，用簡煉的文字加以講述。這是我國傳統的「月令」體裁，也是一種很好的農書體裁。從先秦時期的「夏小正」、呂氏春秋十二紀和禮記月令開端，以後歷代都有這類性質的著作。比較著名的像東漢崔寔的「四民月令」，一向被視爲重要的農書；可惜全書早已不傳，現在僅有幾種輯本。隋書經籍志裏面有一部「田家曆」，還有唐代韋行規的「保生月錄」和韓鄂的「四時纂要」，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宋代人作的「十二月纂要」、「四時栽種記」以及鄧御夫的「農曆」等書，同樣都失傳了。元初所編的「農桑輯要」裏面多次引用的「四時類要」，也是這種性質的一部農書，可是除了「輯要」所引的那些片斷以外，也見不到了。「輯要」最後面「歲用雜事」一節，可能是這部書的一個輪廓。因此



可以說，這部「農桑衣食撮要」要算是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比較最古的一部月令體裁的農書了。以後明代這類的著作也不少，可是像「節令要覽」、「種藝雜曆」以及顧清、陳鳴鶴兩家的「田家月令」，都是不經見的，可能已經失傳。現在還能見到的一種「田家曆」，內容又過於簡單。比較可觀的只有朱權的「臞仙神隱書」和桂萼的「經世民事錄」，而這兩部書的有關部分，基本上又都是轉錄的本書。這樣看起來，本書的可貴就更顯而易見。清代人所寫的這種體裁的農書當中，像蒲松齡的「農蠶經」，我們能見到的只是一個很不完整的草稿。此外唯一可以與本書相提並論的，也許就只有丁宜曾的那部「農圃便覽」了。我們認為採用「月令」的體裁來寫綜合性的農書，是很值得提倡的。這也正是我們整理重刊本書的動機之一。

這部書是元代的三部重要農書之一，另外兩部就是元初官頒的「農桑輯要」和後來王禎所作的「農書」。本書初刻於延祐甲寅，（一三二四年。）王氏農書原序作於皇慶癸丑，（一三二三年。）估計這兩部書寫成的時間相距很近。不過兩位作者大約是互不相知，因而也自然談不到彼此之間有什麼影響。而且兩部書的體裁也絕不相同。反之，「農桑輯要」是盡人皆知的，本書的作者正是有意地把「輯要」的內容加以精簡，使用比較

通俗的文字，並照「月令」的體裁重新編寫成書，目的顯然在於提高書的實用價值，從而把讀者的範圍擴大。因為「輯要」雖然編的也很精煉，但是基本上直引古書原文，當代的人讀起來還是很費力的。本書既不引經據典，也不彫飾詞句，記述各種作業，雖然文字比較簡短，可是非常精當，稱得上是要言不繁。應該說，這是本書的一個特點，同時也是一個優點。

關於書的作者魯明善的身世，除了張杲的序裏面稍稍提到一點而外，找不到任何資料。他是畏吾兒人，也就是現在的維吾爾族。這一族的人在元代多有在文化技術工作方面表現得很出色的，魯氏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的兄弟民族裏面出過這樣優秀的農學家，這確是值得引以自豪的。

這次進行整理是用了三種明代刻本和五種清代刻本互相參校的。三種明代刻本就是農桑撮要本、新刊農桑撮要本和養民月宜本，統稱為「明刻各本」。五種清代刻本是墨海金壺本、珠叢別錄本、長思書室本、半畝園本和清風室本，統稱為「清刻各本」。這五種本子多少都是經叢書編者校訂過的，因而頗有不同之處。農學叢書本和叢書集成本完全是照舊本翻印的，印行的時代也比較最晚，對校勘來說，參考價值不大，所以未加

利用。至於清芬堂本，那只是因為沒有找到，才放棄的。最遺憾的是沒有能够看到四庫全書本。現在我們知道清刻各本比明刻各本內容短少，究竟是當初編纂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漏鈔了呢，還是墨海金壺叢書的編者轉錄四庫全書本時有脫落呢？這個問題，非是看到了四庫全書本不能解決的。照現在的本子來說，清代刻本的編排格式是比較嚴整、合理的。考慮到明人刻書的惡習，我們也未嘗不可懷疑現存明代刻本是否完全保持了本書原刻的面貌。

這次校訂，是以明刻「農桑撮要本」為主，理由是明代刻本內容比較完全，而在三種明刻當中，以「農桑撮要本」的訛誤為最少。各本互相差異的字句非常多，有的地方出入還很不小。對於所有這些差異，都一一作了對比，經過考慮，決定取捨，並把所據的理由，寫成「校記」，附在每個月份原文之後。我們不是爲了校勘而校勘的，目的還是在於使本書變得更有用些。因此，凡是能够肯定的，就肯定下來，同時也指出哪個或哪些本子是錯了。不能肯定的，或者文字雖異而含義相同、無關內容的，就仍依「農桑撮要本」，而在「校記」裏分別註明其他本子的不同字句，以備參考。此外因爲「臚仙神隱書」和「經世民事錄」這兩部明人的書，都是引用了本書的很大部分，其中很有

一些地方是可以用來幫助解決校勘上的問題的，所以也把兩書中相應的字句寫在各該條「校記」的後面，充作佐證。

爲了方便起見，用來參校的各種本子，名稱較長的都給了它一個簡稱：農桑撮要本稱爲「明刻本」。新刊農桑撮要本稱爲「大字本」，原因是書的字體特大。（每頁十六行，每行十三字。）養民月宜本稱爲「月宜本」。清刻各本則墨海金壺本爲「墨海本」，珠叢別錄本爲「珠叢本」，長恩書室本爲「長恩室本」。此外「臚仙神隱書」和「經世民事錄」也分別簡稱爲「神隱書」和「經世錄」。

各種本子除了「月宜本」之外，前面都有作者的自序。「明刻本」除此之外，還有一篇導江張梹所寫的序，「清風室本」前面則有叢書編者錢保塘的一篇短序。這幾篇序文都有參考的價值，這次都收了進來。清刻各本前面又都載入了四庫全書總目的本書提要，也是值得參考的，現在把它作爲附錄，安排在書的後面。

校訂的工作，算是「不自量力」地做了，錯誤當然是難免的，也還有遺留下的不少問題，統待珍視這部書的同志們指正、解決。本書的校訂工作，祇是要求能真實地保存原書的面貌，供大家的參考。至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工作，還有待作進一步的研

究。另外還有一個希望，這就是有的農學家也來用「月令」的體裁編寫一些綜合性的、有地區性的、實用價值很高的現代農書。

王毓瑚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五日